

从文化自信到制度创新：中国式现代化视野下的艺术政策逻辑

宋詹杰

(东国大学, 韩国 首尔中区 04574)

摘要：本文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艺术政策的发展逻辑，强调文化自信与制度创新之间的内在关系。文化自信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战略思想，是推动文化繁荣和民族复兴的精神基础。通过梳理文化自信的理论渊源与实践意义，结合文化现代性的多维特征，文章系统分析了文艺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和体制机制改革中艺术政策的现实实践，指出制度创新是文化自信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路径。文章进一步总结我国文化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政策进展与制度经验，提出未来艺术政策应在法治保障、多元参与、数字治理与文化产业融合等方面持续深化创新。研究认为，文化自信提供价值引领，制度创新提供结构保障，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文化治理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目标注入持续动能。

关键词：艺术政策；文化自信；制度创新；中国式现代化

DOI: doi.org/10.70693/rwsk.v2i1.192

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化自信”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命题和实践指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文化自信不仅是“四个自信”的灵魂，更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内在要求。中国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路径，其显著特征之一是高度重视文化发展和制度保障。正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文化是国家和民族之魂……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在此指引下，如何将文化自信转化为具体的政策举措和制度安排，成为新时代艺术政策研究的关键议题。艺术政策作为文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以文化自信为引领，通过制度创新激发文化创造活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本文将围绕文化自信如何引领艺术政策、制度创新如何保障文化发展的主线展开论述。首先阐释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中的战略意涵；其次探讨文化现代性的内涵及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体现；然后分析文化自信对我国艺术政策实践的引领作用，结合文艺创作、公共文化服务、文化产业发展的案例加以说明；最后总结艺术政策领域制度创新的进展与经验，并提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推动艺术政策创新发展的思路。

一、文化自信的理论基础与时代意涵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与坚定信念。这一理念源自中华文化的深厚传统，在改革开放后逐步形成并走向成熟。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文化自信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3]。文化自信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提供了精神之“钙”，标志着中国人在精神上重拾了主体性。

文化自信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其一，它是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的源泉，为现代化提供精神支撑[3]；其二，它提供道路选择的定力，使中国能够坚定走自己的现代化文化发展之路，不盲目照搬西方模式[4]；其三，它转化为制度创新和政策实践的内在动力，推动破除文化发展体制障碍、完善文化治理体系（如2011年出台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重大决定）[5]。归根结底，文化自信赋予制度创新价值引领，制度创新保障文化自信落地，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激发全民族文化

作者简介：宋詹杰(2001—)，男，韩国东国大学影像大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艺术管理。

通讯作者：宋詹杰

创新创造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1]，这体现了以文化自信提振精神、以制度创新激发活力的统一要求。

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现代性

文化现代性是指文化在现代社会条件下表现出的现代特质，包括思想观念和制度形态的创新转型[6]。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既不照搬西方、也不固步自封，而是选择“以我为主、兼收并蓄”的道路，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统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保持文化主体性又开放包容[3]。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践行“全球本土化”，既积极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又坚持文化自主，努力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7]。

三、文化自信引领下的艺术政策实践

坚定文化自信需要在文艺创作领域推出无愧时代的精品力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创作出与伟大时代相契合、与民族复兴相呼应的优秀文艺作品，以展现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激发全民族文化自信[8]。艺术政策据此加大对现实题材和传统题材创新创作的扶持，引导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富有民族特色和时代精神的作品凝聚人心。近年来《只此青绿》《哪吒》等融合传统与现代的文艺精品纷纷涌现，在政策引导和资金扶持下实现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艺术创新与文化自信形成良性循环。

文化自信归根到底要落实到人民群众文化素养和精神风貌的提升上。正如王一川所言，文化自信不能停留在政府和精英层面的口号，必须落实到全体人民的文化素质建设上[9]。为此，艺术政策着力完善基层文化设施网络，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使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并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当每个普通人都能享有丰富的文化生活并从中受益时，民族文化自信才有最坚实的基础。不仅高雅艺术要繁荣，大众文化也应蓬勃发展——我们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以人民为中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7]。

艺术政策的实施还需要相应的体制机制支撑和经济条件保障。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探索符合国情的艺术管理体制和文化产业发展道路。在艺术管理方面，一批经营性文化单位转制为企业，公益性文艺院团通过内部改革增强活力，同时政府继续支持其公益演出和传统艺术传承，从而兼顾了社会效益与市场效率。这体现了对自身制度优势和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的信心。文化产业方面，2002年以来文化产业被纳入国家经济规划并上升为国家战略[5]，我国在大力扶持影视、出版、演艺、数字内容等产业发展的同时严格把关内容导向，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产业方向。这种“双轮驱动”模式源自高度的文化自信和使命意识：我们相信文化产业不仅可以创造经济效益，更能传播中华文化、提升国民素质，事实证明，这条道路是成功的。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重要的文化产业大国，国产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充分说明文化自信与制度创新的结合为文化发展提供了深厚根基和广阔空间。可见，文化自信贯穿于我国艺术政策实践始终，并为进一步深化文化领域的制度创新奠定了实践基础。

四、艺术政策的制度创新与治理现代化

要让文化自信真正落到实处，必须以制度创新和治理现代化作保障。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提升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将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提升到战略高度。回顾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实践（在文艺出版等领域引入市场机制但总体上文化事业仍由国家包办）、2003年后的全面改革（经营性文化单位推向市场、文化产业纳入国民经济规划并上升为国家战略，2011年提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现代化深化（政府转变职能，运用法律规范和财政政策支持文化发展，减少行政干预，2018年文化部与旅游局合并体现管理创新，文化立法密集出台，社会力量广泛参与文化建设，2019年明确要求完善文化治理体系）。经过多年实践，我们积累了宝贵经验：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是根本前提，以人民为中心和社会效益优先是价值原则，统筹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两手抓”是中国特色，循序渐进、试点先行是有效方法。同时我们也认识到，改革没有终点，需要根据时代条件不断调整深化——如面对互联网技术发展，需要创新监管方式、完善版权和内容审核制度；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需

要提供更高品质、更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和服务。

近年来,我国在艺术政策相关制度创新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政策法规体系更加健全。国家加快文化立法步伐,出台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电影产业促进法等法律,补齐文化领域法治短板,提高文化治理法治化水平[5]。二是文化管理机制更加创新开放。政府大力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优化服务,激发文化市场活力;同时引入社会力量共同治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提高公共文化供给效率,公众由被动接受转为积极参与文化建设,形成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格局。三是文化投入和评价激励机制不断完善。建立文化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探索符合文化规律的评价体系,例如引入专家评审、社会评价和群众满意度等指标。这些举措极大调动了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也使有限的文化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一些地方将文化发展纳入党政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12],使各级政府更加重视文化工作,推动文化建设在基层得到落实。通过以上制度创新,我国文化治理能力显著提升,艺术政策的制度基础更加牢固、执行更加高效。

在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的新征程中,艺术政策的制度创新仍需在多个方面持续用力,以更好满足人民新期待、实现文化强国目标。要继续推进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例如,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升文化治理效能,建设智慧文化管理平台,加强互联网时代文化传播的政策统筹和监管创新;以更加开放包容的方式处理文化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在坚持正确导向前提下,扩大文化领域的社会协商和公众参与,凝聚各方共识。进一步完善文化法治保障。需及时制定出台文化产业促进法、国有文化资产监管条例、网络文化管理条例等法规,为新兴文化领域提供法律依据,并强化执法和司法力度,严厉打击侵权盗版、整治低俗有害内容,保护文化创作者合法权益,让法律成为保障文化健康发展的坚实后盾。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模式,提高服务效能。应根据不同群体需求提供精准的文化服务,深化公共文化机构改革,引入理事会等治理机制增强活力;大力发展数字文化服务,利用5G、VR等技术拓展优质文化资源的覆盖面;健全基层文化志愿者和协管员网络,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城乡群众都能方便参与高质量的文化生活。与此同时,构建更具竞争力和引领力的现代文化产业体系。通过政策引导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着力提升内容创新和核心竞争力,扶持原创IP、民族品牌和精品创作;完善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布局,促进文化与科技、旅游、体育等跨界融合,培育新产业形态;健全文化金融服务体系,拓宽投融资渠道,并防范产业资本无序扩张,确保文化产业在实现规模增长的同时提升质量和影响力,使中国文化产业在创意水平和品牌影响上跻身世界前列。加强文化政策理论研究和专业人才培养也是制度创新的重要保障。应深入总结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文化治理现代化的经验规律,积极参与国际文化政策研究交流,借鉴各国有益做法;同时培养一批既懂文化又通政策、具有国际视野的文化管理专才,提高各级文化治理者的专业化水平。通过以上举措,制度创新将更加科学、理性、富有前瞻性,为中华文化自信的持续深化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为我国艺术政策制度创新提供了广阔舞台和明确目标。只要我们坚定文化自信,保持改革创新精神,与时俱进完善体制机制,我国文化治理能力将不断提升,艺术政策的效能将持续增强。届时,一个运行高效、充满活力、富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治理体系将全面建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提供坚实保障。文化自信在制度护航下,也将绽放出更加夺目的时代光彩。

五、结语

从文化自信到制度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文化发展的主线和内在逻辑。坚定的文化自信为民族复兴注入强大精神动力,而配套的制度创新则将这种动力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文化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本文结合国内外理论与中国实践,阐释了文化自信与艺术政策制度创新如何相互促进。

在理论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论[13]、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论[14]、罗伯逊的全球本土化论[7]等揭示了文化在社会发展和治理中的独特价值,启示我们文化自信的落实有赖制度保障;而李泽厚[4]、张国祚[12]等强调要立足中国实际,走符合自身特点的文化现代化道路。在实践上,新中国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体制改革与文化繁荣成就证明:只有坚持文化自信、不断革新体制,才能收获文化发展的累累硕果。无论艺术创作的繁荣、人民文化生活的丰富,还是文化产业的崛起、文化软实力的提升,都离不开文化自信的引领和制度创新的驱动。正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强调:“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扩大优质文化供给,让人民享有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2],揭示了文化自信与制度创新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关系。

展望未来,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道路任重道远。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进程中,我们的文化自信将更加坚定,制度创新的步伐也将更加稳健。我们将继续弘扬中华文化之魂,吸纳人类文明之光,不断完善文化治理体系和政策机制,以满足人民对美好文化生活的期待。在这一过程中,艺术政策工作者肩负着守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新时代文化创新的使命。只要我们不忘本来、坚定自信,又勇于改革、善于创新,就一定能谱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文化发展篇章。届时,一个文化事业繁荣、文化产业发达、人民高度文化自信的现代文化强国将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经验和智慧。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 新华社, 2022-10-25.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Z]. 北京: 中共中央办公厅, 2022-08-16.
- [3] 张志丹. 顺应实践逻辑 增强文化自信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19-06-14(02).
- [4] 李泽厚, 秦晓. “中国模式”论大大膨胀令人担忧 [J]. 财经, 2010(12 月下).
- [5] Hu Huilin. Chinese Cultural Policy: History, Form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J]. Journal of Forensic Legal & Investigative Sciences, 2019, 5(1): 30.
- [6] 牛学智. 我为什么以“文化现代性”为价值尺度? [J]. 文学自由谈, 2021(01): 43-47.
- [7] 罗兰·罗伯逊, 梁光严译. 全球化: 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P.39-42).
- [8] 袁汪洋. 文化自信视域下的艺术创新 [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4-08-01(07).
- [9] 杨雪. 王一川: 文化自信需尊重中国现代型艺术 [N]. 人民政协报, 2016-08-29(012).
- [10] 奉清清. 让中国文化软实力更硬、更强、更精彩 [N]. 湖南日报, 2017-06-13(004).
- [11]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Z].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11.
- [12] 张国祚. 做强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三个关键环节 [J]. 红旗文稿, 2014(12): 24-26.
- [13] Bourdieu P.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social reproduction[M]//Knowledge, education, and cultural change. Routledge, 2018: 71-112.(P. 71-112).
- [14] 尤尔根·哈贝马斯, 蓝江译.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中信出版集团, 2025.01 (P.53-56).

From Cultural Confidence to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The Logic of Art Policy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Song Zhanjie

(Dongguk University, Seoul Jung-gu 04574)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teractive logic between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art policy under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Grounded i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t draws on classical perspectives such as Bourdieu's theory of cultural capital, Habermas's concept of the public sphere, and Robertson's theory of glocalization to construct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Employing a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e paper examines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China's contemporary art policies. The key areas of analysis include: the conceptual origin and strategic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features of cultural modernity in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guiding role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artistic creation and public cultural services; and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s supporting art policy development.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utually reinforce each other, jointly supporting cultural prosperity and national rejuven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Art Policy; Cultural Confidence;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